

债务危机之后南欧激进左翼政党的政治革新和发展*

王聪聪

内容提要: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南欧激进左翼政党普遍强化了对欧洲一体化的批判性立场,旗帜鲜明地反对建制派政府实施的紧缩政策,并提出了以债务重新谈判、增加就业和战略性部门的国有化为核心的替代性方案。同时,它们还将巩固政党的社会基础,重建与工会、社会运动的联系作为增强政党认同和组织内聚性的重要举措。政治意识形态、组织历史遗产和政党竞争的不同发展态势对南欧各国激进左翼政党在危机中的政治回应和适应性变革产生明显的锁定效应。部分南欧激进左翼政党成功实现“逆袭”,但相当一部分政党未能获得明显的选举收益。激进左翼力量的分散和政策立场的差异、激进右翼政党的强势崛起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整体性复兴。

关键词:南欧 激进左翼政党 政治革新 债务危机 紧缩政策

有关政党转型与调适的理论通常认为,外部环境刺激是政党进行适应性变革的重要促动因素。爆发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在多重维度上开启了欧洲政治的“新时代”,政治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复归、主流政党的代表性危机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欧洲政治的不确定性。欧债危机及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滋生了民众对主流政党和执政精英的不满情绪和幻灭感,也暴露了民主政治的制度性不足。作为债务危机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南欧各国不仅经历了长期的经济衰退,更见证了政坛的剧烈震荡和政治重组。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利用反体制政治动员的边缘性政党,如激进左翼、激进右翼似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1世纪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绿色政治转向研究”(项目编号:17CKS027)的阶段性成果。

乎更明显受益于政治图景的激烈变化。本文主要以南欧各国的激进左翼政党^①为例,考察它们如何对危机进行政治回应,如何调整其政治纲领和社会动员战略;它们是否遵循相似的回应路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哪些因素影响着政党的战略选择。最后,结合近十年来南欧地区国内大选、欧洲议会选举数据以及激进左翼政党执政情况,本文将进一步回答南欧激进左翼是否真正抓住了危机所带来的“机会之窗”而显著提高了选举成绩和政治影响力。

一 南欧激进左翼的政治革新:政治纲领层面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南欧激进左翼政党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层面的一个显著变化是政治立场的激进化,一方面表现在对欧盟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批判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对国内政府紧缩政策的批判上。无论是传统共产党,还是“新左翼”政党,它们都站在了反紧缩政策的前线和国内右翼政府的对立面。南欧激进左翼政党的政策取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强化了对欧洲一体化的批判性立场。南欧各国共产党侧重于从制度性批判的维度来认识经济和债务危机,认为这是一场生产过剩的危机。^②例如,在葡萄牙共产党看来,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及欧洲债务危机根植于资本主义深层次的结构性危机,危机进一步暴露出当前资本主义的剥削性、压迫性、侵略性和掠夺性。^③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深化,加剧了世界各国在阶级问题、发展问题和民族问题等方面的冲突,使得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大行其道。南欧各国共产党普遍认为,日益恶化的国内局势是中右、中左翼政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和欧洲一体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欧盟和欧元服务于大资本和主要欧洲大国的利益,在欧盟的发展框架中,南欧各国日渐处于从属、边缘化和被殖民的地位。例如,希腊共产党在第十九次党代会的政治决议中指出:“过度积累的危机(the crises of over-accumulation)定期爆发考验着欧元区的凝聚力,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在工业生产结构、生产力水平、欧盟和世界市场的地位方面存

^① 本文分析的南欧激进左翼政党主要包括葡萄牙共产党、葡萄牙左翼联盟、希腊共产党、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西班牙联合左翼、西班牙“我们能”党和意大利重建共产党。

^② 于海清:《债务危机下南欧四国共产党的发展动态》,载《党建》,2011年第1期,第46-47页。

^③ Portuguese Communist Party (PCP), “With the Workers and the People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Political Resolution*, Approved by the XX Congress, 2-4 December 2016, <http://www.pcp.pt/en/xxth-congress-pcp/political-resolution>, last accessed on 28 May 2019.

在深度的不平衡”。^① 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希腊共产党进一步强调,欧元区的凝聚力正以矛盾的方式发展,并导致日益严重的分裂主义倾向和“欧洲怀疑主义”。^② 葡萄牙共产党同样指出,欧盟的发展并没有带来欧洲经济和社会的融合,反而导致经济增长的巨大不平衡、资本的集中与社会的衰退,德国和法国在欧洲联盟内加强和深化了具有殖民性质的政治和经济统治关系,欧元并非“抵御危机的保护盾”,而是经济和金融危机持续的主要因素,因此,对欧盟、欧元的“臣服”正在限制和危及葡萄牙的国家主权。^③

与共产党对欧盟、欧洲一体化根本性的反对立场不同,“新左翼”政党并不主张本国退出欧盟或欧元区,而是不满足于现有的欧盟条约,并聚焦于对欧盟“无所作为”的批判,希望建立一个团结的新欧洲。在葡萄牙左翼联盟看来,欧洲几十年不平衡的一体化进程和蕴含其中的新自由主义共识正改变着欧洲的政治版图,导致威权主义的回归和极右翼势力的政治崛起,而欧盟在打击财政倾销、解决人道主义危机和气候变化危机、推动能源转型、提供体面工资和促进社会平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葡萄牙左翼联盟强调:“我们捍卫劳工权利和社会权利在内的民族国家的民主主权”“一个团结的欧洲必须建立在各国之间平衡的经济关系的基础上”“这个欧洲永远不会出现在目前的欧盟条约中,它永远不会被城墙所包围”。^④ 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指出,尽管欧洲出现了政治裂缝,但新自由主义霸权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而政党的主要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欧盟肆无忌惮的勒索、反对紧缩政策和种族主义的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联盟,从而履行作为希腊主要政治力量新角色的任务。^⑤ 西班牙联合左翼认为,西班牙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政权危机和“民主破裂”,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即议会和代议制机构主权的丧失,欧盟等超国家机构正通过新自由主义模式和欧盟条约对 1978

^① Communist Party of Greece, *Programme of the KKE*, Adopted by 19th Congress of the KKE, 11-14 April 2013, <http://inter.kke.gr/en/articles/Programme-of-the-KKE/>, last accessed on 18 June 2019.

^② Communist Party of Greece, *Political Resolution of the 20th Congress of the KKE, Athens*, 30 March-2 April 2017, <https://inter.kke.gr/en/articles/POLITICAL-RESOLUTION-OF-THE-20th-CONGRESS-OF-THE-KKE/>, last accessed on 8 June 2019.

^③ Portuguese Communist Party (PCP), “With the Workers and the People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④ Left Bloc (Portugal), *Europeias 2019: Manifesto eleitoral do Bloco*, April 2019, <https://www.bloco.org/media/ManifestoEuropeias2019.pdf>, last accessed on 12 June 2019.

^⑤ SYRIZA, *Text of Policy Decision*, Adopted on 12-16 October 2016, <https://www.syriza.gr/article/id/67313/Politikh-Apofash-2oy-Synedrioy.html>, last accessed on 13 June 2019.

年宪法构成挑战,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①

第二,旗帜鲜明地反对建制派政府实施的紧缩政策。推翻国内右翼或左翼政府与“三驾马车”^②签订的“备忘录”(债务救助协议)是南欧各国激进左翼政党的核心政治任务。正如葡萄牙左翼联盟在纲领中所强调的,“我们的核心倡议是通过政治和社会的团结来破坏备忘录”“为建立一个左翼的政府而奋斗”。^③在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紧缩政策)、捍卫工薪阶层权利方面,共产党和“新左翼”政党具有一致的政治诉求。以葡萄牙为例,共产党和左翼联盟激烈批判中右翼的社会民主党和人民党联合政府(2011—2015年)实施的紧缩政策。在它们看来,这一政策的实施严重剥夺了工人们的权利、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和剥削,并导致国家严重的结构性赤字和民主退化。因此,自2015年大选后,中左翼的社会党上台执政,无疑是左派力量的一个标志性胜利。但如何在防止社会民主党或人民党重新掌权的同时,避免右翼政策继续在左翼政府中得到执行,也是激进左翼政党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葡萄牙共产党指出:“为捍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完整,需要远离右翼政策,摆脱资本利益的统治和欧盟的强制性约束,开辟一条替代性的、以爱国主义和左翼政策为核心的发展道路。”^④

在深陷经济危机泥潭的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实施了以“人民”为中心、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反紧缩政策的政治动员。在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看来,作为“补救措施”的“备忘录”政策被证明是具有毁灭性的,它比金融危机本身更具破坏性。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积极将自己打造为反对备忘录、反对紧缩政策、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建制派的政治代表,特别是区分了“支持备忘录”和“反对备忘录”的政治阵营。^⑤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主要任务就是代表普通大众来反对“支持备忘录”和损害国家主权的政治力量,推翻旧政权而拯救因紧缩政策陷入困境的社会阶层。希腊共产党则坚持其一贯的反对资本、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政党的斗争路线,积极与机会主义做斗争,强烈抵制资产

^① United Left (Spain), “La izquierda para un país que lucha” *Estrategia IU 19/20* (“The Left for a Country that Fights”—IU Strategy 19/20), 13. 01. 2019, http://izquierdaunida.es/sites/default/files/doc/La%20izquierda%20para%20un%20pa%C3%81s%20que%20lucha%20-%20Estrategia%20IU%2019_20.pdf, last accessed on 25 April 2019.

^② “三驾马车”指欧盟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③ Left Bloc (Portugal), *The Left Against the Debt*, Approved by the 8th Congress of Left Bloc, 2013, <http://www.bloco.org/media/mocaoVIIIconvBEen.pdf>, last accessed on 13 May 2019.

^④ Portuguese Communist Party (PCP), “With the Workers and the People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Political Resolution*, Approved by the XX Congress, 2–4 December 2016, <http://www.pep.pt/en/xxth-congress-pep/political-resolution>, last accessed on 28 May 2019.

^⑤ Giorgos Katsambekis, “Radical Left Populism in Contemporary Greece: Syriza’s Trajectory from Minoritarian Opposition to Power,” *Constellations*, Vol.23, No.3, 2016, pp.391–403.

阶级的政治路线,无论其是由新民主党或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实施的(旧的),还是由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和独立希腊党人实施的(新的)。^① 希腊共产党一方面指责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以“左翼”的身份以及与新民主党“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来误导和反复欺骗工人阶级和广大民众,另一方面也强调必须加强与新民主党的对抗,后者正试图利用民众对“左翼”政府的不满而提出新的服务于资本利益的政府解决方案。在西班牙,“我们能”党在纲领中明确提出要放弃紧缩政策,“避免进一步消耗未来并扭转近年来发生的削减政策,我们未来几年的战略与人民党的战略截然不同,因为它颠覆了优先顺序”。^② 西班牙联合左翼指出,摆脱资本主义的危机需要一致的目标,即克服当前由新自由主义所主导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模式,并为结束资本主义创造条件。^③ 为此,该党希望废除工人社会党政府和右翼政治力量的政策,并实施宪法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和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

第三,提出激进左翼政党的替代性方案。国家债务问题是南欧激进左翼政党的一个主导性议题,“债务是所有政治问题的关键”。^④ 如何解决债务危机和摆脱社会经济衰退,是南欧激进左翼政党替代性方案的核心。具体而言,它主要包含四方面的倡议:一是债务审计和债务的重新谈判。葡萄牙共产党和左翼联盟在不同的政治纲领中均强调要就公共债务的期限、利息和数额进行重新谈判,以确保债务偿还符合公共投资、发展和创造就业的需要,并认为这是捍卫葡萄牙主权的核心要素和先决条件。例如,葡萄牙左翼联盟在2016年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提到,公共债务和融资制度是国家最大的威胁,重新谈判公共债务并对私人银行进行系统性干预至关重要;^⑤在2018年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该党继续强调“债务重组和公共控制经济战略部门是左翼治理的关键”。^⑥ 西班牙“我们能”党在2015年国内大选中呼吁废除工人社会党政

① Communist Party of Greece (KKE), *Political Resolution of the 20th Congress of the KKE*.

② Podemos (Spain), *Elecciones Generales 2016 Memoria Económica*, 2016, <https://lasonrisadeunpais.es/wp-content/plugins/programa/data/programa-economica.pdf>, last accessed on 26 June 2019.

③ United Left (Spain), *Propuestas Electorales Izquierda Unida Elecciones, 2011 (Electoral Proposals of United Left for 2011 Election)*, <http://izquierda-unida.es/taxonomy/term/52>, last accessed on 3 June 2019.

④ Left Bloc (Portugal), *Unite For Jobs Against Bankruptcy*, Approved by the 7th Congress of Left Bloc, 2011, <https://www.esquerda.net/sites/default/files/files/mocaoengversion11.pdf>, last accessed on 20 May 2019.

⑤ Left Bloc (Portugal), *The Strength of Hope Left Bloc Aiming for Majority*, Approved by the 10th Congress of Left Bloc, 25–26 June 2016, http://www.bloco.org/media/mocaoA_Xconv_EN.pdf, last accessed on 18 May 2019.

⑥ Left Bloc (Portugal), *A Stronger Bloc to Change the Country*, Approved by the 11th Congress of Left Bloc, 10–11 November 2018, https://www.bloco.org/media/mocao_XIConv_english.pdf, last accessed on 18 May 2019.

府于2011年修订的“西班牙宪法”第135条,建立议会债务审计制度,重组西班牙债务。^①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在2015年上台执政前一直呼吁就债务问题与国际债权人重新谈判。在2013年7月的政党成立大会上,该党将摆脱国家危机、制止国内社会灾难的恶化、实现生产和消费模式的社会转型作为战略目标。2015年7月被迫与国际债权人签订第三轮救助协议后,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指出,该协议并非出于政党的本意或体现“左翼的所有权”,而是为了规避希腊破产和退出欧元区的风险而做出的妥协。^②

二是以增加就业为核心的经济恢复方案。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和紧缩政策是激进左翼政党共同的政治主张,如何保障就业和稳定工资、捍卫工薪阶层利益、实现经济增长是它们关注的重点。作为社会党少数政府的支持力量,葡萄牙左翼联盟提出了以重建劳工权利和促进充分就业为核心的左派管理方案,希望能以社会主义、生态主义、女性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视角参与经济和社会转型。该方案的主要倡议包括公共债务重组、战略部门的国有化、税收改革、公立学校和国家卫生服务改革、能源转型与绿色发展、提高透明度和反腐败斗争等。^③同样作为社会党政府的议会支持力量,葡萄牙共产党将其政治替代方案定义为“爱国的”和“左翼的”,前者以实现国家主权独立为核心目标,后者以促进政治和社会进步为目标,旨在提高工人和人民的权利和收入。^④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在2015-2019年两个执政期内,聚焦于税收制度改革、养老金制度改革、政府机构改革、打击腐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虽然在第三轮救助协议的框架下,以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为主导的联合政府不得不继续实施削减养老金、提高税率措施,但也尽可能捍卫劳工权利、集体谈判和罢工权利等。西班牙联合左翼和“我们能”党同样将恢复经济作为政党的优先政策议题,希望国家能够创造体面的就业、废除最新的养老制度改革、反对养老金的私有化、建立一个公平的税收制度、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恢复战略性经济部门的公共控制等。

三是战略性部门的国有化和公共服务的扩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各国福利制度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使得“社会团结”观念下的“共识政治”和保障劳动者权益的社会机制受到侵蚀,^⑤而紧缩政策框架下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养老金和工资的削减使

^① Podemos, *Queremos, Sabemos, Podemos (A Programme to Change Our Country)*, Programme for General Election 2015, <https://lasonrisadeunpais.es/programa/>, last accessed on 15 June 2019.

^② SYRIZA, *Text of Policy Decision*.

^③ Left Bloc (Portugal), *A Stronger Bloc to Change the Country*.

^④ Portuguese Communist Party (PCP), “With the Workers and the People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⑤ 张浚:《欧洲的国家转型及其政治图景——从欧洲民粹主义谈起》,载《欧洲研究》,2018年第3期,第42-60页。

得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捍卫社会福利制度、实现战略性经济部门的公共控制是激进左翼政党传统的政策主张。在西班牙联合左翼看来,不仅是公共教育和健康、养老金等社会服务需要国家的保障,公共所有权和民主化还应该扩展到基础设施、能源、住房和金融体系以及可持续发展领域。例如,在2015年选举纲领中,该党继续强调水资源获取是一项基本人权和普遍利益,积极支持水资源的重新国有化。^① 西班牙“我们能”党在2016年的选举倡议中提出一项增进社会福利和经济现代化的方案,其核心是希望通过增加公共投资来强化福利国家和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② 在2019年欧洲议会大选纲领中,葡萄牙左翼联盟呼吁捍卫自由的、普遍的和优质的公共服务,包括卫生系统、公立学校、公共住房等,而这些公共服务正受到欧盟条约的限制。^③

四是国家机构的民主化改革。在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看来,推动国家的民主化和各个层面公共管理机构的改革是重建希腊社会的必备条件,包括通过修订宪法来确保公共产品的公共性、所有公民享有同等的政治机会以及国家机构中代表权的扩大等。^④ 近些年来,西班牙联合左翼和“我们能”党都将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作为核心政治倡议。例如,西班牙联合左翼2011年的选举纲领前两项内容为“走出经济危机的方案”和“先进民主的建议”。“我们能”党的自我定位是成为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和政治转型工具,希望通过恢复人民对国家机构的有效民主控制而实现政治参与的真正民主化。在西班牙联合左翼看来,经济危机已衍生出代议制民主的制度性危机,因而有必要通过人民的民主参与来制定一部真正服务于人民的宪法,以实现“先进民主”。“在这一框架内,一个联邦、共和与团结的国家将捍卫自由和政治参与,保障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福祉”。^⑤ “我们能”党同样建议通过宪法框架的修改来改变西班牙生产模式,改变政党内部的监管框架,确保公共机构能够提供住房、体面工作和教育等权利,保证所有西班牙人的政治平等。^⑥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希腊、西班牙还是葡萄牙,南欧地区的激进左翼政党都希望

① United Left (Spain), *Cuadernos Programáticos Papala Unidad Popular*, (Programmatic Blocks for the Popular Unit), Program of United Left for 2015 Election, http://izquierdaunida.es/sites/default/files/doc/Programa_Completo_IU_Elecciones_Generales_20D_2015.pdf, last accessed on 14 June 2019.

② Podemos (Spain), *Elecciones Generales 2016 Memoria Económica*.

③ Left Bloc (Portugal), *Europeias 2019: Manifesto eleitoral do Bloco*, April 2019, <https://www.bloco.org/media/ManifestoEuropeias2019.pdf>, last accessed on 12 June 2019.

④ SYRIZA, *Text of Policy Decision*.

⑤ United Left (Spain), *Cuadernos Programáticos Papala Unidad Popular* (Programmatic Blocks for the Popular Unit), Program of United Left for 2015 Election.

⑥ Podemos, *Queremos, Sabemos, Podemos (A Programme to Change Our Country)*, Programme for General Election 2015, <https://lasonrisadeunpais.es/programa/>, last accessed on 15 June 2019.

通过左翼及其他社会力量的政治联合来实现综合的社会转型,这种倡议在政治纲领中清晰可见。例如,在2019年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西班牙联合左翼就提出“民众团结”的政治战略,指出“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背景之下,我们需要保护受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威胁的自由权利,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式是政治团结”“我们的政治组织的力量是不够的,因此必须与其他社会和政治行动者团结一致”。^①从1986年西班牙共产党转型成为西班牙联合左翼时,就归入绿色左翼政治派别。2016年西班牙大选,西班牙联合左翼与“我们能”党联合参选,组建“团结的我们能”(United We Can)政党联盟。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在不同的纲领文件中也多次强调,要通过与其他国家激进左翼政党以及部分社会民主党、绿党的合作建立广泛的反对新自由主义和紧缩政策的政治联盟,以实现欧洲政治版图的变化。

二 南欧激进左翼的政治革新:组织结构层面

国内外政党研究学者的一个普遍性共识是,作为联系公民与政治过程最重要纽带的政党已“今非昔比”,其守门人的角色正在慢慢褪色。基希海默等人认为,很多传统政党弱化了其意识形态立场以及与委托人的联系而转型成为“全方位型政党”。在菲利普·C·施密特看来,民意数据的运用、超政党候选人的提名等现代政治过程的发展,使得政党整合公民利益和诉求的能力受到严重侵蚀和削弱。^②政党认同和政党公信力的下降、选举投票率的降低、政党形象的“模糊化”等在不同程度上表明,传统政党与公民社会的联系正在松动。因而,强化政党的社会根基以及对特定阶层的代表性,以保障政治过程的“公意”,成为包括激进左翼政党在内的几乎所有政党的最重要的战略任务之一。

与其他政党家族相比,激进左翼政党的政治合法性更依赖于其与公民社会的联系,无论是来自共产主义传统对工人阶级代表性的强调,还是来自左翼自由主义传统对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的重视。^③换言之,意识形态代表性对于激进左翼政党而言

^① United Left (Spain), “La izquierda para un país que lucha” *Estrategia IU 19/20* (“The Left for a Country that Fights”—IU Strategy 19/20). ”

^② [美]菲利普·C·施密特:《政党今非昔比》,载[美]拉里·戴蒙德、[美]理查德·冈瑟等:《政党与民主》,徐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7-85页。

^③ Myrto Tsakatika and Costas Eleftheriou, “The Radical Left’s Turn towards Civil Society in Greece: One Strategy, Two Paths,” *South European Society and Politics*, Vol.18, No.1, 2013, pp.81-89.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巩固和吸纳党员、重建与工会和社会运动之间的联系,成为近些年来激进左翼政党增强政党认同和组织内聚性、夯实政治合法性的普遍战略选择。正如米尔托·萨卡蒂卡和马尔科·利斯所指出的,近20年来南欧所有的激进左翼政党都在强化社会基础,追求社会联系战略,“重回基层”。^①南欧激进左翼政党在组织结构层面的革新主要包含两个维度:一是政党内部的政治动员;二是政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联系。

就政党内部的组织革新而言,葡萄牙共产党、希腊共产党和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等传统共产党在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础上,将重塑组织战斗力与凝聚力、巩固政党的工人阶级基础作为工作重点。在2013年通过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希腊共产党强调政党将不断拓宽、更新与工人阶级的革命性纽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阶级斗争新的转向中创造社会财富。^②希腊共产党强化党组织建设的主要举措包括:在工作场所部署党的干部和力量、聚焦大型工业和重要战略性行业(港口、机场、能源、电信、医疗等)的政党建设、通过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持续系统的政治路线宣传来扩大党的影响力等。^③此外,希腊共产党还通过加强对“希腊共产主义青年团”(KNE)的培育和引导,来确保党员招募的数量和质量。葡萄牙共产党在2012年的十九大和2016年的二十大中都强调,要创造性地发展民主集中制,在新的形势下通过经验来加强和确保党内民主、单一路线和单一中央领导。近些年来,葡萄牙共产党出台系列措施、决议来加强组织建设,如2013年出台的《更多的组织、更好的活动、更多的影响力——一个更加强大的葡萄牙共产党》决议;2014年初至2015年4月举行的全国招聘活动——“葡萄牙未来的四月精神”;2014年发起的全国党员联系行动,强化党员活动、更新党员数据、更新党员卡片等。^④意大利重建共产党也强调党机构内部的关系必须以自由和民主为导向,并将这一原则贯穿于社会生活中。^⑤意大利重建共产党鼓励和支持党内建立独立的协会和其他内部组织、鼓励党员参与相关活动并为政策决策提供建议。

^① Myrto Tsakatika and Marco Lisi, “Zippering’ up My Boots, Goin’ Back to My Roots’: Radical Left Parties in Southern Europe,” *South European Society and Politics*, Vol.18, No.1, 2013, pp.1-19.

^② Communist Party of Greece (KKE), *Programme of the KKE*, Adopted by 19th Congress of the KKE, 11-14 April 2013, <http://inter.kke.gr/en/articles/Programme-of-the-KKE/>, last accessed on 18 June 2019.

^③ Communist Party of Greece (KKE), *Political Resolution of the 20th Congress of the KKE*.

^④ Portuguese Communist Party (PCP), “With the Workers and the People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⑤ Communist Refoundation Party of Italy, *Party Statute*, Approved by the 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RC, Perugia, 6-8 December 2013, <http://web.rifondazione.it/home/index.php/73-partito-contenuti/21640-statuto-approvato-ix-congresso>, last accessed on 22 June 2019.

葡萄牙左翼联盟、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等“新左翼”政党在成立之初就试图在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上与传统共产党相区别。与共产党较为严格的招募程序、较强的组织纪律性和官僚化的组织结构相比,它们一方面更多地采取一种网络化和灵活性的组织结构模式,倡导多元政治、参与性民主、松散的成员联系和低程度的结构性规范。另一方面,葡萄牙左翼联盟、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西班牙联合左翼、西班牙“我们能”党与社会运动有着天然联系,它们鼓励或发动了环境运动、和平运动、女性运动和全球正义运动等,并在组织结构层面拥有与社会运动类似的特征,如去中心化的政策制定机制等。^①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之后,为更好地凝聚党内力量,“新左翼”政党一方面继续鼓励政党成员参与纲领制定、创新党内民主形式,另一方面也在不同程度上强化全国政党组织机构的权威和建设、加强政党的集中化以及对成员的控制。例如,葡萄牙左翼联盟在2013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强调,组织调整的重点是创设更加积极地参与决策的形式和路径、扩大思想交流的网络。^② 西班牙联合左翼也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加横向、民主和透明的组织,打造一个开放、多元和友好的政治参与空间。在2016年的党代会上,该党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包括协调员在内的党的管理机构的直选。虽然在党员参与机制以及政治抗议运动中有相对较好的表现,但西班牙联合左翼在融入社会,如建立党员与社会网络、社区联系方面依然存在较大的困难。^③ 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在2016年党的文件中指出,政党成员有单独和集体表达意见的权利,但政党需要一个统一的政治中心——中央委员会负责制定政策,并与政治秘书处一起负责实施。^④ 事实证明,多元主义是一把双刃剑,葡萄牙左翼联盟、希腊激进左翼联盟都经历了因党内的多元政治派别而导致的政党分裂。^⑤ 组织内部的宗派主义影响了葡

^① Giorgos Charalambous and Iasonas Lamprianou, “Societal Responses to the Post-2008 Economic Crisis among South European and Irish Radical Left Parties: Continuity or Change and Why?”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51, No. 2, 2016, pp.261-293.

^② Left Bloc of Portugal, *The Left Against the Debt*, Approved by the 8th Congress of Left Bloc, 2013, <http://www.bloco.org/media/mocaoVIIIconvBEen.pdf>, last accessed on 13 May 2019.

^③ United Left (Spain), “*La izquierda para un país que lucha*” *Estrategia IU 19/20* (“The Left for a Country that Fights”—IU Strategy 19/20).

^④ SYRIZA, *Text of Policy Decision*.

^⑤ 在葡萄牙,吉尔·加西亚领导的“革命左翼前线”(Revolutionary Left Front)在2011年退出政党,2013年党的创建人丹尼尔·奥利维拉因党内战略分歧而退党。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后,安娜·德拉戈领导的党内右派“宣言论坛”(Manifesto Forum)退出政党。在希腊,2010年,“革新左翼”(Renewal Wings)从“左翼运动生态联盟”(SYN,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前身)分离出来后组成“民主左翼”(DIMAR),并于2012年加入新民主党领导的联合政府。

萄牙左翼联盟的凝聚力,也使得该党较难向选民呈现出一个团结的政党形象。^① 2010年希腊左翼运动生态联盟(激进左翼联盟的前身)的内部分裂,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党内的不同声音,奠定了齐普拉斯在党内的政治地位和权威。

在政党与公民社会关系方面,共产党普遍加强了与工会等附属组织的联系、希望重组工人运动。葡萄牙共产党、希腊共产党、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更多地采用传统的社会动员方式,通过其附属的工会组织,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指导社会组织的发展,进行罢工或示威游行。^② 例如,希腊共产党一直将控制和加强“劳工团结联盟工会”(PAME)作为工作重点之一,经济危机爆发后,“劳工团结联盟工会”在全国、地域和地方等不同层面都组织了系列罢工运动,如阿斯普罗皮戈斯钢铁工业的罢工。希腊共产党在2017年第二十次党的代表大会中决定建立“社会联盟”(Social Alliance),以更好地指导工人在革命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社会联盟由反资本主义、反垄断的社会力量构成,其成员来自主流生产方式相关领域,而没有年龄性别的歧视。”^③葡萄牙共产党也较好地维系了与葡萄牙最大的工会组织——“葡萄牙劳工总工会”(CGTP)的密切联系,并站在维护工薪阶层利益的最前线。葡萄牙共产党积极支持工人、工薪阶层、年轻人等社会群体不同形式的抗议运动,如2013年的大罢工。同时,“葡萄牙劳工总工会”也多次在全国和地方发起抗议政府实施紧缩政策的示威游行和罢工活动。此外,葡萄牙共产党还保持着与“全国农业协会”(CNA)和“共产主义学生联盟”(UEC)等其他重要附属组织的联系。

与共产党强大的基层组织相比,“新左翼”政党在传统的工人运动和主要的工会组织中基本是隐性、边缘化的存在。例如,葡萄牙左翼联盟的主要工会成员局限于国有公司、教育等领域,在主要的工会组织中基本没有影响力。希腊激进联盟建立的“激进左翼工会联盟网络”(SYRIZ A Network of Trade Unionists)也并未实质性提升该党在工会组织中的影响力。除努力通过其成员建立与工会组织的联系之外,“新左翼”政党积极活跃于社会运动中,并建立与社会论坛(Social Forum)之间的联系。^④ 希

^① Andre Freire and Marco Lisi, “The Portuguese Radical Left and the Great Recession: Old Challenges and New Responses,” in Luke March and Daniel Keith, eds., *Europe's Radical Left from Marginality to the Mainstream*, Rowman &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2016, pp.253-268.

^② Myrto Tsakatika and Marco Lisi, “‘Zipping’ up My Boots, Goin’ Back to My Roots’: Radical Left Parties in Southern Europe,” pp.1-19.

^③ Communist Party of Greece, *Political Resolution of the 20th Congress of the KKE*.

^④ Myrto Tsakatika and Marco Lisi, “‘Zipping’ up My Boots, Goin’ Back to My Roots’: Radical Left Parties in Southern Europe,” pp.1-19.

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制定了社会运动交互性学习的战略,特别是通过其青年组织“左翼联盟青年”(SYN Youth)建立了与社会运动的广泛、密切联系。^①“左翼联盟青年”的骨干成员是“希腊社会论坛”(Greek Social Forum)的主要推动力量,多次参与全球正义运动和反紧缩政策运动,如希腊的“广场运动”“不付费运动”等。与此同时,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也积极将社会运动的政治诉求(如反对“备忘录”政策)整合到政党纲领中。与葡萄牙共产党对社会运动的怀疑态度相比,葡萄牙左翼联盟则致力于与社会运动保持稳定的联系,从历史上看,生态运动等“后物质主义”派别是该党的创始团体之一,近年来,该党也积极支持全球正义运动。在债务危机背景下,葡萄牙左翼联盟主要从三个方面支持新社会运动:一是在组织层面支持党员和活动家参与社会运动;二是在纲领中反映社会运动的政治诉求;三是领导人的重合,即政党成员同时担任相关协会会员。^②

由于社会运动的反体制、反政党特质,它们常常将传统政党,包括激进左翼政党当作僵化的政治体制的一部分而对其持怀疑态度。例如,西班牙联合左翼虽然有很多成员参与“愤怒者运动”,但该党未能在该运动中发挥关键性领导作用;葡萄牙左翼在建立与社会运动联系方面也并不理想,如2012-2013年葡萄牙工会大罢工也未能为激进左翼政党带来明显的选举红利。

三 影响南欧激进左翼政治革新的因素

在相似外部环境(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刺激下,南欧各国激进左翼政党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政治回应和政党适应性变革,反对紧缩政策、反对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加强党内组织建设、强化政党与公民社会的联系是它们的共同特征。但从上文的分析也可以看到,各国激进左翼政党在危机中的社会动员战略、纲领诉求和政治立场等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在乔戈斯·查拉姆布斯和伊索纳斯·兰布里亚努等学者看来,政党本身的内部特征——意识形态和组织遗产是影响激进左翼政党回应危机战略

^① Myrto Tsakatika and Costas Eleftheriou, “The Radical Left’s Turn towards Civil Society in Greece: One Strategy, Two Paths,” pp.81-89.

^② Marco Lisi, “Rediscovering Civil Society? Renewal and Continuity in the Portuguese Radical Left,” *South European Society and Politics*, Vol.18, No.1, 2013, pp.21-39.

的最重要因素,历史起源的多元性决定了它们不同的政策立场和社会联系策略。^① 密托·扎卡提卡和马尔科·利西在研究南欧激进左翼政党的社会联系战略时同样指出,政党的组织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激进左翼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② 基于国内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本文主要从三个维度来阐释影响南欧激进左翼政党政治革新的因素:意识形态、组织模式和选举刺激。

第一,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在南欧各国激进左翼的政治谱系中,通常既存在传统共产党,又存在革新派的“新左翼”政党,在希腊和葡萄牙尤为明显。它们虽然都具有反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但在具体政治倡议、战略路径选择方面却存在较强的异质性。在政治立场方面,传统共产党通常将自己定位为反体制政党,而“新左翼”政党则认同资本主义的代议制民主。在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方面,二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欧洲议题和后物质主义议题。葡萄牙共产党和希腊共产党等传统共产党持有强硬的欧洲怀疑主义立场,它们反对本国加入欧盟和欧元区,认为欧洲一体化是导致战争、恐怖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社会衰退、大规模失业的根本原因。在欧债危机、英国脱欧、极右翼政党异军突起的背景下,共产党进一步强化了欧洲一体化的批判立场,指责欧盟是服务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复兴的工具,并严重威胁着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如葡萄牙共产党认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与反革命进程联系在一起,使葡萄牙陷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由大资本利益和欧洲单极主义所支配的欧盟具有明显的阶级性质,它是一个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容的事物,是一个与人民的基本权利相冲突的政治项目。^③ 相比之下,“新左翼”政党对欧盟制度化则持一种建设性立场。葡萄牙左翼联盟、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和西班牙联合左翼深受“欧洲共产主义”历史遗产的影响,虽然它们并不认同欧盟条约中的新自由主义本质,但对欧洲货币联盟的基本判断是,它能够作为一个潜在进步的工具来实现一个真正团结的、社会和经济融合的欧洲。^④ 另一方面,“新左翼”政党对泛欧洲层面的跨国合作更加开放,积极参与欧洲层面的政党“欧洲左翼党”和欧洲议会的“欧洲

^① Giorgos Charalambous and Iasonas Lamprianou, “Societal Responses to the Post-2008 Economic Crisis among South European and Irish Radical Left Parties: Continuity or Change and Why?”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51, No. 2, 2016, pp.261-293.

^② Myrto Tsakatika and Marco Lisi, “‘Zipping’ up My Boots, Goin’ Back to My Roots’: Radical Left Parties in Southern Europe,” pp.1-19.

^③ Portuguese Communist Party (PCP), “With the Workers and the People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④ Richard Dunphy, *Contesting Capitalism? Left partie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69.

联合左翼—北欧绿色左翼党团”的活动。

同时,“新左翼”政党还因对后物质主义议题的强烈关注而区别于传统共产党。葡萄牙左翼联盟建立的初衷就是希望搭建传统社会主义和新社会运动的桥梁,将社会主义、反资本主义和女性主义、生态运动、反种族与性别歧视相结合,填补国内政坛“新左翼”的政治空白。^① 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前身“希腊左翼生态运动联盟”(SYN)缘起于党内改革派1991年从希腊共产党的分离,希望占据希腊社会中“新左翼/后物质主义”的政治空间,通过生态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等吸引青年和中间选民。^② 在2013年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第一届代表大会上,该党继续呼吁要动员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反帝国主义、工会会员、农村运动、激进的女性运动和生态运动、知识分子等不同的社会力量来共同完成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在2007年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葡萄牙左翼联盟将自己重新定位于“生态社会主义政党”,关注气候变化、能源政策、生态议题,“左翼联盟必须带来一场生态革命,作为我们社会主义转型过程的一部分”。^③ 在2019年的欧洲议会大选中,葡萄牙左翼联盟倡议构建一种“绿色”和“红色”相融合的团结经济,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挑战的背景之下创造高质量的工作,并主张在欧洲所有的公共政策以及工业、商业项目中对气候变化影响进行评估,取消欧洲投资银行以及相关银行对化石燃料的补贴。^④ 环境、生态和女性主义议题也是西班牙联合左翼政治纲领中较为显著的议题。在2011年的西班牙大选中,该党主张对自然资源进行战略性管理,推广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关闭所有核电站,建立绿色税收体系和可持续的交通运输体系等。在2015年西班牙大选中,西班牙联合左翼继续强调能源转型将为整个国家带来积极的外部效应,希望到2050年实现100%的可再生能源供应。^⑤ 相比之下,葡萄牙共产党、希腊共产党在基本纲领和选举政治纲领中几乎很少涉及环境议题以及其他后物质主义议题,而主要关注工人阶级的工资、权利、社会保障等传统“旧”政治议题。

^① José Soeiro, “The ‘Bloco de Esquerda’ and the Founding of a New Left in Portugal,” in Cornelia Hildebrandt and Birgit Daiber, eds., *The Left in Europe. Political Parties and Party Alliances between Norway and Turkey*, Rosa Luxemburg Foundation, 2009, pp.178-179.

^② Stathis N. Kalyvas and Nikos Marantzidis, “The Two Paths of the Greek Communist Movement (1985-2001),” in Joan Botella and Luis Ramiro, eds., *The Crisis of Communism and Party Change. The Evolution of West Europea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Parties*, Barcelona: Inst. de Ciències Politiques i Socials, 2003, p.23.

^③ Left Bloc (Portugal), *Left Socialism As Alternative Socrates Government*, Approved by the 5th Congress of Left Bloc, 2007, <http://www.bloco.org/media/teses5conv.pdf>, last accessed on 28 June 2019.

^④ Left Bloc (Portugal), *Europeias 2019: Manifesto eleitoral do Bloco*.

^⑤ United Left (Spain), *Cuadernos Programáticos Papala Unidad Popular (Programmatic Blocks for the Popular Unit)*, Program of United Left for 2015 Election.

第二,政党的组织模式和历史遗产。南欧激进左翼政党差异化的社会联系战略主要源于政党历史遗产和组织轨迹的不同。^①从历史起源看,传统共产党和“新左翼”政党在组织层面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模式:前者与党员保持稳定密切的联系,而后者则与党员保持相对松散的联系。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南欧各国共产党继续奉行工人阶级优先的政治联盟策略,重构党的基层组织,规范成员招募程序,通过更多的政治宣传和党员活动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在社会联系方面,共产党的侧重点是通过其附属工会和青年组织来进行社会动员、支持工人罢工和社会抗议活动,并不热衷于建立与社会运动的联系,也没有超越其特定的文化结构而建立更广泛的社会基础。“新左翼”政党更倾向于捍卫党内的多元主义、扩大党内民主和基层参与,由于与新社会运动的历史渊源,它们更重视单一议题社会动员,致力于维护和发展与新社会运动的联系。“新左翼”政党对后物质主义团体、反紧缩政策团体、全球正义运动,以及其他社会多元团体持包容和开放态度,鼓励其成员参与这些抗议运动来强化彼此之间的联系。整体而言,由于组织模式的不同,共产党将强化与附属组织(特别是工会)的联系置于优先地位,而“新左翼”在试图扩展在工会组织影响力的基础上,努力保持与社会组织开放共生的关系,建立更多实用主义联盟。就希腊而言,在一种多重矛盾并发、流动的政治环境中,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内部的多元主义及对社会运动、社会组织的开放性,似乎比希腊共产党更具有适应性和优势,^②前者在危机时刻强化了合法性并获得显著的政治影响力和支持率。

第三,选举刺激和横向竞争。政党构建议题的范围、政治战略的调整同样深受选举环境的影响,选举的挫败或胜利、既存政党的挑战和竞争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政党领导层施加压力。大部分南欧激进左翼政党都是国内的小规模政党或边缘性政党,^③在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普遍性崛起和传统主流政党公信力、制度合法性骤降的背景之下,它们面临较为严苛的生存挑战:一方面,激进左翼政党不能为简单地取悦部分选民而牺牲其独特性与核心政治认同;另一方面,激进左翼政党需要承担更多政治责任并提出替代性方案。面对建制派政府的紧缩政策,南欧激进左翼政党普遍采取了激进的对抗性策略,希望通过重新谈判来削减债务和终结紧缩政策。其中,希腊激进

^① T. Verge, "Party Strategies towards Civil Society in New Democracies: The Spanish Case," *Party Politics*, Vol.18, No.1, 2012, pp.45-60.

^② Myrto Tsakatika and Costas Eleftheriou, "The Radical Left's Turn towards Civil Society in Greece: One Strategy, Two Paths," pp.81-89.

^③ 希腊激进左翼联盟除外,但该党在2012年之前的选举支持率也未超过5%。

左翼联盟和西班牙“我们能”党获得了显著的选举政治突破。在一些观察者看来,2012年的希腊大选是激进左翼联盟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获得近27%的选票而成为国内主要的反对党之后,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走向了实用主义和改革主义,积极向“政府中的政党”转型。^① 为避免社会和政治的继续衰退,以及人民党等中右翼政党获得议会多数代表权,西班牙联合左翼积极推动左翼政党的联合。在2016年的西班牙大选中,西班牙联合左翼和“我们能”党组建新的政党联盟“团结的我们能”党,但选举结果并不理想,该党获得的票数比上一次选举中联合左翼和“我们能”党的总票数减少了100万张。由于历史性原因和政策分歧,葡萄牙左翼力量高度碎片化并缺乏合作,特别是社会党拒绝与共产党以任何形式组成政治联盟,但2015年葡萄牙大选之后,为了防止右翼政府继续执政、紧缩政策继续得到执行,社会党组建了少数政府,并得到共产党和左翼联盟的支持。形势变动导致葡萄牙政党体制的变化,两个激进左翼政党的政策目标,以及社会党职位最大化的目标促成了它们的联合。^② 从葡萄牙共产党和左翼联盟的角度来看,与社会党达成的政府协议是实施反紧缩政策的重要战略工具。

四 选举政治视域中的南欧激进左翼政党

从整个欧洲范围来看,南欧激进左翼政党是在多重危机中成功实现“逆袭”的典型代表,尤其是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和西班牙的“我们能”党。金融危机及其带来的经济困境在南欧各国造就了复杂的政治场景,不稳定的投票行为和具有波动性的政治制度成为常态。2011年分别于西班牙和希腊爆发的“愤怒者运动”和“广场运动”集中表达了选民对主流政党的不满和愤怒,“精英”和“人民”的政治裂痕进一步凸显。

在西班牙,2014年新成立的旨在恢复民主和捍卫人权的民粹主义政党——“我们能”党成为政治乱局的明显受益者。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西班牙社会工人党和人民党的得票率均达到历史低点,而第一次参加大选的“我们能”党获得不俗的成绩(7.89%的支持率),五名议员进入欧洲议会,引发广泛关注(见表1)。在2015年西班牙

^① John Milios, “From ‘Subversion’ to Centre-Left Pragmatism,”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12016345_SYRIZA_From_'Subversion'_to_Centre-Left_Pragmatism, last accessed on 8 January 2019.

^② Marco Lisi, “U-Turn: The Portuguese Radical Left from Marginality to Government Support,” *South European Society and Politics*, Vol.21, No.4, 2016, pp.541-560.

表 1 南欧激进左翼政党欧洲议会选举结果(2009-2019 年)

政党/年份	2009 年欧洲议会选举	2014 年欧洲议会选举	2019 年欧洲议会选举
西班牙 联合左翼	得票率 3.73% ^a 1 名议员 (GUE/NGL)	得票率 10.03% ^b 5 名议员 (GUE/NGL) 1 名议员 (Greens/EFA)	得票率 10.7% ^c 5 名议员 (GUE/NGL) 1 名议员 (Greens/EFA)
西班牙 “我们能”		得票率 7.89% 5 名议员 (GUE/NGL)	得票率 10.7% ^c 5 名议员 (GUE/NGL) 1 名议员 (Greens/EFA)
葡萄牙 共产党	得票率 10.64% ^d 2 名议员 (GUE/NGL)	得票率 13.71% ^d 3 名议员 (GUE/NGL)	得票率 6.88% ^d 2 名议员 (GUE/NGL)
葡萄牙 左翼联盟	得票率 10.72% 3 名议员 (GUE/NGL)	得票率 4.93% 1 名议员 (GUE/NGL)	得票率 10.56% 2 名议员 (GUE/NGL)
希腊 共产党	得票率 8.35% 1 名议员 (GUE/NGL)	得票率 6.11% 2 名议员 (独立议员)	得票率 5.35% 2 名议员 (独立议员)
希腊 激进左翼联盟	得票率 4.70% 1 名议员 (GUE/NGL)	得票率 26.57% 6 名议员 (GUE/NGL)	得票率 23.76% 6 名议员 (GUE/NGL)

资料来源: <http://www.europarl.europa.eu>, 2019 年 7 月 5 日访问。GUE/NGL: 欧洲联合左翼-北欧绿色左翼联邦党团 (Confederal Group of the European United Left - Nordic Green Left); Greens/EFA: 欧洲绿党-自由联盟议会党团 (Group of the Greens/European Free Alliance)。a. 2009 年欧洲议会选举, “联合左翼”(IU) 和其他左翼团体组建选举联盟 “IU-ICV-EUIA-BA”; b. 2014 年欧洲议会选举, “联合左翼”(IU) 和其他左翼团体组建选举联盟 Coal (IU+ IV+Anova+et al); c. 2014 年欧洲议会选举, “团结的我们能”党 (United We Can) 和“联合左翼”(IU) 即其他左翼团体组建选举联盟 Coal (UP+IU+Catalug+Barcelona); d. 选举数据为“团结民主联盟”(CDU) 的得票率, 它是由葡萄牙共产党 (PCP) 和葡萄牙绿党 (PEV) 组成。

牙的大选中, “我们能”党获得 20.7% 的全国选票, 成为继社会工人党和人民党之后的第三大党。由于政治纲领的左翼倾向, 以及政治宣传中反建制、反精英的话语逻辑, “我们能”党通常被看作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在一些学者看来, 投票者更愿意支持新的激进左翼民粹主义政党而非既存的激进左翼政党, 主要在于“我们能”党以一个独立的激进左翼的抗争者的形象而存在, 它吸引着对政府和主流政党深感愤怒和失望的人群、深受危机影响和低度政治信任的支持者以及疑欧主义者。^① 相比之下, 西班牙

^① Luis Ramiro and Raul Gomez, “Radical-Left Populism during the Great Recession: Podemos and Its Competition with the Established Radical Left,” *Political Studies*, Vol.65, No.1S, 2017, pp.108-126.

联合左翼的政治表现和政治影响力“黯然失色”,2008年、2011年和2015年西班牙大选中,该党的支持率分别为3.8%、6.9%和3.7%(见表2)。“团结的我们能”党在

表2 南欧激进左翼政党国内大选得票率(%),2007-2019年

政党/年份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5年	2016年	2019年
西班牙 联合左翼		3.8		6.9			3.7	21.2a	14.3a
西班牙 “我们能”							20.7	21.2a	14.3a
葡萄牙 共产党			7.9b	7.9b			8.3b		
葡萄牙 左翼联盟			9.8	5.2			10.2		
希腊 共产党	8.2		7.5		8.5(I) 4.5(II)		5.5(I) 5.6(II)		
希腊 激进左翼联盟	5.0		4.6		16.8(I) 26.9(II)		36.3(I) 35.5(II)		

资料来源: <http://www.parties-and-elections.eu>, 2019年7月5日访问。a. 2016年和2019年西班牙大选,“联合左翼”(IU)和“我们能”党(PEDOMOS)组建“团结的我们能”党(United We Can); b. 选举数据为“团结民主联盟”(CDU)的得票率,它是由葡萄牙共产党(PCP)和葡萄牙绿党(PEV)组成。在2011年和2015年葡萄牙大选中,共产党和绿党的议席数分别为14/2、15/2。

2016年获得21.2%的全国选票以及议会中71个议席,成为全国第三大党,但这一结果并未达到政党的预期。2018年12月,安达卢西亚的地区选举再次显示了政党联盟的矛盾性结果。与西班牙联合左翼和“我们能”党之前的总票数相比,“团结的我们能”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所获得的选票大约减少了30万张。“团结的我们能”党支持率的下滑在西班牙2019年的大选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仅获得14.3%的选票,成为议会中第四大党。

严重的债务危机导致希腊政坛动荡,两大传统的中左翼(泛希腊社会运动党)和中右翼(新民主党)政党面临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特别是2011年中左政府签署紧

急备忘录协议后,引发民众大规模抗议和游行。在政治体制的结构性危机和代表性危机的背景之下,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在反对建制派紧缩政策的斗争中迅速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多数派,并在2012年的希腊大选中获得历史性突破,分别获得16.8%和26.9%的选票,成为国内最大的反对党。在2015年1月的大选中,激进左翼联盟进一步呼吁恢复人民主权来对抗既定的“寡头政治”,承诺将人民从不断持续的紧缩政策中解放出来。人民最终选择了“希望”而不是“恐惧”。^①此次大选中,激进左翼联盟最终获得36.3%的选票,成为国内第一大党,并与独立希腊党人结成联盟政府。在2015-2019年两届政府任期内,获得权力的激进左翼联盟不得不挣扎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履行两个截然相反的承诺,特别是与国际债权人签署第三轮救助协议而被迫实施严苛的紧缩政策后,总理齐普拉斯的人气暴跌,而政党也面临支持率下降、党内分裂等问题。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激进左翼联盟获得23.76%的选票,落后于主要竞争对手新民主党(33.12%)。希腊共产党的选举支持率则相对稳定,在5.5%-8.5%之间波动(见表2),在国内议会拥有15名左右的议员,在欧洲议会拥有1-2名议员。

葡萄牙虽然也深受债务危机困扰,但并没有见证“新”的激进左翼政党或传统的激进左翼政党的狂飙突进。葡萄牙共产党和绿党所组建的“团结民主联盟”在近十年的选举支持率维持在8%左右(见表2),2011年和2015年葡萄牙大选中,共产党的议席数分别为14和15。葡萄牙共产党在欧洲议会选举的表现也相对平稳,在欧洲议会有2-3名议员。与共产党相对稳定的选举成绩相比,葡萄牙左翼联盟的选举表现更具波动性,特别是2011年国内大选和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该党的得票分别为5.2%和4.93%,糟糕的选举结果导致党内两个派别退出政党。在2015年葡萄牙大选中,左翼联盟获得10.2%的选票和议会中19个议席,成为第三大党。

五 结语

债务危机所衍生的制度性危机,使得南欧各国政坛极具波动性,也塑造了一个更加竞争性的政治空间。南欧激进左翼政党普遍投入到反对紧缩政策、反对不稳定工作的斗争中,进一步强化了对欧盟和本国执政精英的批判性立场,同时将巩固社会基础和政党认同作为工作重点。政治意识形态、组织历史遗产和政党竞争的不同态势对南

^① Giorgos Katsambekis, “Radical Left Populism in Contemporary Greece: Syriza’s Trajectory from Minoritarian Opposition to Power,” pp.391-403.

欧各国激进左翼政党在危机中的政治回应和适应性变革产生明显的锁定效应和路径依赖。在鼓吹“人民主权”、制造“精英”与“人民”对立的政治舆论场景中,具有左翼民粹主义色彩的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和西班牙“我们能”党脱颖而出,迅速崛起或掌握最高权力,成为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复兴的“星星之火”。但也应看到,这两个政党的崛起具有某种特殊性,南欧共产党以及其他激进左翼政党则显得“默默无闻”。同样,从整个欧洲范围来看,激进左翼政党在相对贫穷和小国中表现得更好,而在一些经济状况良好或较大的国家中,激进左翼常被激进右翼力量所压倒。

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和西班牙“我们能”党的选举政治成功取决于多重因素,如传统主流政党的政治实力、国内政治文化和政治遗产、经济形势、政治机遇、激进左翼政党的领导层和政治战略等。与希腊相比,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社会民主党更有弹性,民众对它们的政治信任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而得以缓慢恢复,因而,这两个国家的激进左翼未能成为左翼政治谱系中的替代力量。对于激进左翼政党而言,能否赢得选举上台执政是一回事,而是否有能力化解国家的多重危机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后者,则将会损害政党的政治声誉和合法性认同,其作为一种新的替代性力量的真实性也会大打折扣。

从近十年的发展来看,南欧激进左翼政党以及更广范围的欧洲激进左翼政党依然处于分裂和碎片化的状态,或如一些学者所称的“马赛克式的左翼”。^① 由于历史原因以及政策立场分歧,共产党和“新左翼”政党缺乏合作,因而也难以在多重危机中形成合力而成为一股进步性的左翼替代力量。另一方面,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等左翼政党都面临来自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挑战,后者的反移民反欧盟的民族主义议程长期占据国内政治议程,并在迎合民意的过程中转化为选举优势。对于激进左翼政党而言,政党传统价值观,特别是左翼的国际团结原则使得它们很难改变自己的移民政策而真正回应激进右翼政党在话语权方面的霸权。在此意义上,欧洲激进左翼能否实现整体性复兴依然是悬而未决的。

(作者简介:王聪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责任编辑:宋晓敏)

^① Luke March, "Beyond Syriza and Podemos, other Radical Left Parties Are Threatening to Break into the Mainstream of European Politics," <http://blogs.lse.ac.uk/europpblog/2015/03/24/beyond-syriza-and-podemos-other-radical-left-parties-are-threatening-to-break-into-the-mainstream-of-european-politics/>, last accessed on 11 December 2018.